

让中华古籍真正“活起来”

周飞亚

传承之光

核心阅读

全国图书馆系统古籍修复人才从10多年前的不足100人,增至如今约1000人,年轻人成为主力,半数拥有本科、硕士或博士学位,修复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

原始书影的数字化转换,仅仅是第一步。更值得期待的是通过人工智能对古籍内容进行深度处理和知识提取,实现古籍文本的结构化、体系化甚至图谱化。

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拉开帷幕,首次对全国古籍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普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古籍的分级管理、保护修复、整理出版、研究利用等。15年的努力,让多少珍贵古籍得以“重见天日”?古籍的生存环境有了怎样的改善?为古籍“续命”的修复技艺,有哪些传承与创新?数字化如何助力古籍“活”起来?

家底基本摸清,每部古籍都拥有了一张“身份证”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年代久远等原因,大量古籍已流失或毁坏。究竟有多少珍贵古籍得以“重见天日”,成功留存下来?

全国古籍普查显示,仅汉文古籍就有3000万册左右。

经过普查,每部古籍都拥有了一张“身份证”。打开中国古籍保护网“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输入编号或书名,古籍的著者、版本、册数、馆藏单位等信息,均可轻松查询。如今,这个数据库已累计发布264家单位共797.3万册/件的古籍普查数据。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介绍,目前,全国古籍普查已完成270余万部1.8万函。30个省份基本完成汉文普查,占预计汉文总量的90%以上。共2861家单位完成普查登记,古籍家底基本摸清。经过普查,发现了《永乐大典》“湖”字册、3件晚唐五代时期的木版雕刻印刷品、清代初拓本《乾隆御定石经》等一批珍贵文献。

收藏环境直接决定着古籍的保存质量和寿命。不恰当的温度和湿度、光照辐射、空气污染、微生物和虫害等,都会对古籍造成伤害。古人很早就摸索出了一些书籍保护经验,

如明清皇家档案馆皇史宬,通过厚墙体、无梁殿等设计,尽可能营造出恒温恒湿少光照的环境。现代书库更有一套详细规范。早在2006年,原文化部就曾制定相关标准,2014年,修订后的《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发布,相关单位也以此为标准,努力改善古籍存储条件。

10多年来,13026部古籍分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3家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通过评审,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库房条件有所改善,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

古籍修复是一门科学,高学历年轻人成为修复主力军

叶,是古籍特有的数量词。古代纸张多为单面印刷,书册由一叶一叶双面折叠装订而成。一叶,相当于现代书籍的两页。10多年来,依托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古籍修复总量已超过385万叶。其中包括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山东省图书馆藏宋刻本《文选》等珍贵文献。

但更多的古籍还在等待那个能让时间停步,让它们恢复“健康”的人。

10多年前,全国图书馆系统拥有的修复师不足100名,学历以高中、大专为主,年龄多在40岁以上。如今,通过在职培训、师徒传承、高校教学“三驾马车”,修复师数量已增至约1000人,半数拥有本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年轻人已成为主力,修复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

多功能纤维测量仪能直接观察纤维形态,从而诊断纸张的“病情”。新式脱酸设备能实现整本文献批量脱酸,不仅更高效,且不会影响古籍外观。“古籍修复是一门技艺,更是一门科学。不仅要实践,还要懂理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过去修复师所依靠的传统经验,被科技揭开了原理,修复变得更加精准高效。

修复流程也变得更加严格规范。检测了解古籍的年代、装帧形式、破损情况和纸张类别,绘制病害图,制定修复方案,选配纸张、染纸、打浆糊、拆页、补缀、装订……每一个重要步骤都要拍照存档。陈红彦表示,这样能更好地实现“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小干预,过程可逆”的修复原则。“古籍修复有着悠久传统,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关于书籍修复手法的记载。明代《装潢志》里讲的‘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至今我们仍在遵循,即没有相应的技术或手艺,宁可不动,避免破坏性修复。”

鸡叫城遗址考古新收获

郭伟民

位于洞庭湖西北澧阳平原的鸡叫城遗址,以其科学的田野考古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入围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鸡叫城遗址考古始于20世纪90年代,2019年再次启动,经过连续3年发掘,收获颇多。

洞庭湖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是通过考古构建的。早在距今50万年前就有人类分布于洞庭湖及周边。考古发现了湘北澧水类群和湘西澧水类群两个旧石器文化序列。距今10万年前后,这两个主要类群仍在继续发展,直到距今1.5万年前后才出现重大变化,人类开始磨制石器、烧制陶器、驯化水稻,并建立固定的居所。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发现了距今1.8万—1.2万年间的丰富文化堆积,根据陶片复原了一件完整的陶釜。数枚距今1.2万年的水稻已具有某些栽培稻特点,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驯化水稻。

距今1万年前的彭头山文化成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在澧阳平原上40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17处该文化遗址,肥沃的冲积土壤和水系为稻作农业提供了优越条件。沅水和湘江中上游山区河谷地带的高庙文化,出土了刻印纹白陶,兽面獠牙、太阳纹、八角形纹、凤鸟纹诡奇绚丽。这两种文化的扩散与融合又催生了距今6300年前后的城头山文化。鸡叫城遗址大概就在这一时期。

鸡叫城遗址的最早遗存在彭头山文化时期,大溪文化时期再次有人定居,发展到油子岭文化时期开始形成环壕聚落。屈家岭文化时期将环壕填平,并在环壕外开挖城壕,挖出来的土堆成城墙。这里曾是一片湖沼,后来湖沼逐渐成陆,更多人来此定居,开沟排涝,围堤造田。

标示为F63的大型建筑遗址保存十分完好。这是一座五开间七室、面积420平方米的“豪宅”,加上外围廊道,总面积达630平方米,建筑木材为楠木和樟木。考古显示,其整体结构是地台式加干栏式的木构建筑。主体外墙及每间的隔墙均是先在台基上开挖基槽,基槽内铺木板。然后在木板上立柱,木柱极为考究,以直径约0.5米的半圆形大木柱为主体,间以长方形小木柱,转角处以1/4圆木作为转承(如图)。垫上又宽又长的木板,能够增加受力面积,防止柱子在松软的土地上下陷。这间大房子为理解长江流域史前建筑形式与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不同情况的古籍,修复难度不同。一个经验丰富、操作熟练的修复师,每天修复几叶已经算比较快的了,遇到问题还得随时停下来做研究、做实验。而古籍会在使用中损坏,也会因岁月侵蚀自然老化,曾经修复好的,可能过一阵还得拿出来重修。

埋首故纸间,妙手补千年。修复师与时间的赛跑,将一直持续。

让古籍里的知识、故事、思想等进入大脑,给予人们更多滋养

在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看来,古籍保护有3种类型: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传承性保护。“原生性保护就是保护古籍文物本身;再生性保护是指对古籍进行影印、数字化,并进一步整理;传承性保护,是指让古籍里的知识、故事、思想等进入人们的大脑,通过这一载体传承下去。”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国学基本典籍丛刊》、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一带一路”相关古籍文献以及历代海洋文献、石刻文献……随着国家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工程的推进,一大批古籍影印出版。“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10万部(件),包括数字古籍、数字方志、敦煌遗书等多个板块,无需注册登录即可直接浏览,可谓真正的“零门槛”。

原始书影的数字化转换,仅仅是第一步。更值得期待的是通过人工智能对古籍内容进行深度处理和知识提取,实现古籍文本的结构化、体系化甚至图谱化。如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古籍自动整理系统,能给古籍加标点,对人名、地名、官职、时间等进行标记,准确率高达94%—98%。系统从儒家理学巨著《宋元学案》中自动提取“弟子”“家学”“交游”等人物关系,可视化呈现了“宋代学术关系网络图”。大部头的典籍、海量的文字,转化为一幅幅知识图谱,研究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为古籍文化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传播开辟了新路径。

普通人与古籍的亲密接触,也在不断发生。日前上线的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集中讲述了这些人的故事。有人历时5年做出了古籍中记载的300多道宋代佳肴,有人通过古籍考证还原古代服饰,有人以古籍版刻为母版设计了4万多个艺术字……

让古籍“活”起来的尝试,近年来还有很多。《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古书复活记》等节目不断创新。多家图书馆纷纷依托古籍资源推出文创产品。阅文平台发起“甲骨文”主题征文,10天内收到2500多作品。各地古籍收藏单位联合举办“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延续古人“曝书护书”之习俗,更取当下“晒”字“展示分享”之新意。不仅晒当地的文物珍宝,也晒修复、装帧、传拓等相关技艺,有的还能现场体验。

存续中华文脉的古籍,将被更多的人以各种方式看见,给予人们更多文化滋养。

图①:修复后的古籍清宫“天禄琳琅”。

图②:古籍《宋元学案》。

图③:孔子博物馆藏《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

图④:修复师正在进行古籍修复。

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供图

版式设计:赵德汝



吴良镛速写。

罗雪村绘

吴良镛

行万里路

谋万家居

单霁翔

2022年5月,吴良镛先生将迎来100周岁生日。

1922年,吴良镛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2012年2月14日上午,90岁高龄、大病初愈的吴良镛,获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是以“人民建筑师”身份跻身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行列的第一人。评审委员会在评审意见中写道:“吴良镛院士是我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他建立了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为实现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的目标提供理论框架。”

他获得的荣誉很多很多。2016年,国际永久编号为9221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吴良镛星”。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和奖章。2021年,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我就是个建筑工作者,爱自己的祖国,爱这个社会,建筑最核心的是为人服务。”他说。

吴良镛最骄傲的是在清华大学建筑教育岗位工作了70多年。1940年7月27日,他所生活的重庆合川城遭日军空袭,大半座城被大火吞噬。刚刚高中毕业的他深感“天下之大,却无安乐之土”,遂放弃原来的理想,希望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一名建筑师,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他走进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毕业后,梁思成请他到“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协助编制《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目录》,随后一同去清华大学建筑系当助教。“跟随梁思成先生到清华大学,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吴良镛以治学严谨著称,对于每一名学生的学习成果严格把关。他强调学习的前瞻性,对涉及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他强调学习的系统性,在旁征博引的前提下加以融会贯通的综合研究。他强调学习的针对性,要求结合实际工作,力争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我作为他的博士,一直跟随他学习。先生为学严谨、行事勤勉、创作不倦,永远是我人生的楷模。

吴良镛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区域研究、人居环境科学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令人赞叹的业绩。1984年退休后,他开始了行万里路、谋万家居的上下求索。曲阜中国孔子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新校园、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等建筑设计,桂林市中心区详细规划、无锡市空间发展规划等城市规划,以及苏州总体规划发展研究、北京奥林匹克建设研究等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都是他的成果。多年来,他和同事们不知疲倦地奔忙着,没有双休日、寒暑假,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久,常常凌晨3时起床工作,“鏖战”两三个小时之后,稍事休息又准时上班。为了方便携带东西,他特意做了一个小拉杆箱。每天清晨和傍晚,人们总能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拖着装满图书和资料的拉杆箱走过校园,成为清华园一景。

2008年夏天,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工程正处于重要阶段,86岁的吴良镛因过度疲劳,加上没有及时饮水,脑部神经受损,右侧的半边身子动弹不得,不能穿衣执筷。此后近一年半时间,他都是在康复中心的病房里度过。他坦然面对这一切,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康复治疗。每次我们去探望,他都在刻苦进行各种康复锻炼,“别人一天练4个小时,我就练8小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尽早站起来,回到我热爱的建筑领域。”正是因为有着远超常人的毅力,经过一年多的康复治疗,吴先生已经可以慢慢走路。“身体再好一点,能参加更多工作”,他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最质朴的愿望。出院那天,康复医院的院长说他创造了康复医学领域的一个奇迹。但我们每一个学生都知道,这样的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离不开心爱的事业,离不开终身追求的理想。

2010年,重返工作岗位的吴良镛迸发出更多创意。在他床边,总放着一支笔、一个本,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本子记录下新想到的问题。2016年春节,他写了一副春联用以自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抽匠迈年豪情未已!”这是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充满激情的表达。如今,吴良镛已是百岁老人,但“年高未忘忧国”,让更多百姓“诗意栖居”于广阔大地,依然是他的梦想。



考古中国

